

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医学家

——纪念孙思邈诞生1400周年

姚 远

一、生平概况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的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生于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死于公元682年（唐高宗永淳元年）。今年是他的诞辰1400周年。

孙思邈幼年就勤攻苦读，天赋聪明，七岁时就能日诵千言，青年时期，即博涉诸子百家学说，兼通佛典，学问很是渊博。孙思邈家境穷苦，少时多病，深为疾患所折磨，因而他立志学医。21岁隋文帝仁寿元年时，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自己的病身也因调治而痊愈。从此，他更潜心学医，常常不远千里去虚心请教，医术不断提高，名声渐大，赢得了四方赞誉。后来，有许多著名人士，如宋令文、孟洗成、卢照邻等，都曾尊他为师。在孙思邈20岁时，隋文帝曾要他去做国子监博士（主持教育行政的官），但他鄙视权贵，厌恶当时社会上争附豪门的恶习，不愿入朝作官，托病推辞了。隋文帝仁寿四年，孙思邈进士及第，亦未入仕途。后来唐太宗和唐高宗也曾召他进京作官，他都没有接受。约在50多岁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孙思邈大都隐居在太白山、终南山、峨眉山、五台山等地。约在公元674年唐高宗光德坊宅第赐给孙思邈居住，

孙思邈是和扁鹊、华佗、张仲景齐名的我国古代杰出的医生之一。他与张仲景、张衡、祖冲之、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并称为古代八大科学家。他在继承发扬我国古代医家成就方面，在药理学、营养学、针灸学、炼丹学、医疗技术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以及留给后世的两部重要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还有他高尚的医德，在我国医学史上记下了闪光的一页。

二、辉煌成就

孙思邈本是信仰道家的人，但他不抱成见，不仅总结了唐代以前的祖国医学成就，并

本文曾得到李继斌、谢文宗和西安医学院钱效杰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且汲取了外国（如印度）的医药经验，编入他的著作。正是由于这种博采群经众史，勤求古今中外的治学态度和他80多年丰富的临症经验，因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1）医学巨著《千金方》

孙思邈的两部重要著作：《千金要方》（一名《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他自己行医经验的结晶，凝聚着他一生的辛劳和艰苦。据史载，孙思邈70多岁时写成《千金要方》，百岁时写成《千金翼方》。

《千金要方》：成书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它广泛辑录了前代各家方书及民间验方，叙述妇、儿、内、外各科疾病的诊断、预防与主治方药，食物营养、针灸等。其中所列方剂，有些药味较多，有一病而立数方、或一方治数病，内容丰富，保存了唐以前的不少医学文献资料。

《千金翼方》：是《千金要方》的续编，所以称为“翼方”。书中详论了多种药物的性味、主治等，其中有些是唐以前未收录的新药和外来药物。例如其中对内、外各科病症的诊治在《千金要方》基础上均有增补，并收录了当时医家所秘藏的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选录《千金要方》所未载的古代方剂2,000余条。很多方药都赖本书得以保存下来。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共计约100多万字，它收集整理了前人和民间医方6,500多个（《千金要方》中4,500多个，《千金翼方》中2,000多个）。其中除引用张仲景、华佗、陈延之、支法存等很多名医的医方外，还搜集了流传在广大人民、少数民族、文人学士、官僚、宗教界和外国医书中的很多医方。从我国有文献记载到隋唐期间散乱浩博的医书，差不多都经他整理加工、删裁求简。它使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医学理论、杂散药方、针灸等浩繁内容，合而为一，荟萃成集。

《千金方》首创“复方”，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大革新。

人们把《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本书常合称为《千金方》。孙思邈之所以把他的书冠以“千金”二字，这在《千金要方》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把人的生命比作千金，因之，遂有书名《千金要方》。

《千金方》也有一些缺陷。如在吸收诸家成就中，缺乏批判，有点兼容并蓄。另外，也没有注明参考文献出处，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不利的影 响。其次在《千金翼方》中，除仍有《养性》，一卷以外，又增加了《避谷》、《退居》、《补益》、《飞练》各一卷。还有卷末的《禁经》二卷中，都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还介绍了符咒禁鬼等迷信方法，这是不好的。但这些究竟是次要的，《千金方》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著作。

《千金方》编成后约20年，就被日本留学生带回日本，作为医药教科书，对朝鲜医学也颇有影响。公元10世纪日本丹波康赖氏所撰的《医心方》就以孙思邈的医书作为重要参考。在药王山孙思邈医学著作陈列室里，还有日本后藤敏根据元代版本翻刻的《千金方》，就是孙氏著作外传的例证。此外，公元15世纪朝鲜金礼蒙等人编纂的大型医学丛书《医方类聚》，也从《千金方》中收取了不少内容。

在国内，宋代的林亿等人，曾奉敕对《千金方》进行校订，于公元1066年印行。林亿曾指出：“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

说之所未至。”。这是对《千金方》很恰切的评价。清代徐灵胎在其《医学源流》中认为《千金方》“偏”和“杂”的谈法是不妥当的。但他仍认为该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后来，历代都有《千金方》的刻本，流行甚广。公元1124年，郭思编《千金宝要方》刻石于华州公署。公元1572年，秦王朱守中又将《千金宝要方》刻成石碑立于药王山太玄洞前。清代的张璐于公元1698年，写成他的研究心得——《千金方衍义》，并称赞孙思邈的著作：“伏读三十卷中，法意良美，圣谟洋洋，其辨治之条分缕晰，制方之反激逆从。非神而明之，其孰能与其斯手。”

（2）药理学成就

孙思邈在药理学方面有不少创见。他发现了药物的采集时节与药物的质量有极大关系。在《千金翼方》中共记载了238味植物药的采集时节和处理方法，甚至还注出那一时节采根，那一时节去采花和茎。他在著作中曾写到：“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他还举出了680种常用药，让人们平时多加采集，以备急要之用。孙思邈还很重视药物的产地，于是列举出133个州所产的共计519种“道地”药材，基本上包括了全国当时所有的地方。药理学上这样独到的专论和全面的见解，的确是罕见的。现代中药科学实验研究证明，药物的产地和药物的采集时间与药物发挥治疗作用的有效成份含量多少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他以胎盘入药，治疗诸虚证，以羊靛，鹿靛入药治瘰，以青羊胆入药治诸疮、青盲、咳嗽等等，为药源开辟了新的领域。

（3）营养病学成就

在继承前代医家成就的基础上，孙思邈正确地阐明了许多营养病的防治问题。《千金要方》中载有关于瘰瘤（即甲状腺肿大）、夜盲、脚气等病症的治法。其中在公元651年间提出脚气病的病因是缺乏某种营养并提出用谷皮煮汤混入粥内常常服用，可以预防脚气病发生的理论，比欧洲人迟至公元1642年的论述要早1,000年。

（4）妇、儿科成就

孙思邈对妇、儿科尤其重视，是他首次把妇科、儿科从内科中分离出来，各自独立成科。在30卷《千金要方》中，妇人方占了3卷，30卷《千金翼方》中，妇人篇占4卷，婴童方占1卷，并且都置之于首要地位。他对妇女的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伤以及接生、新生儿护理、哺乳法，乳母卫生、选择乳母的条件等问题均有科学的见解，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如对选择乳母的条件，他指出：“乳母形色所宜，其候甚多，不可求备，但取不狐臭、瘰、瘰、气嗽、疥、痴、癩、白、秃、疔、疡、沈唇、耳聋、鼻、鼻、鼻、鼻。无此疾者，便可饮儿也”。他所规定的这些选择乳母的条件，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小儿皮肤娇嫩，对营养的要求全面，神经系统正处于发展的高潮阶段，小儿的精神状态对其所存在的外界环境反应很敏锐，其模仿能力极强。而上述这些疾患，如狐臭、甲状腺肿大、瘰疮、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疥疮、头癣、淋巴腺结核、白痴、慢性溃疡、副鼻窦、耳聋、癫痫等病，对小儿的健康发育显然是不利的。

后来，宋代陈自明于嘉熙元年（1237年）撰写我国较早的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和宋代钱乙著、阎孝忠所辑的3卷《小儿药证直诀》都曾受了孙思邈直接的影响。

（5）炼丹化学成就

炼丹术是化学的原始形式。无论是在实验操作技术的发明上,或是在无机药物的应用上,都给医药科学的化学实验起了开路作用。它的实验纪录是人类文化历史上不可轻视的珍贵文献。

孙思邈有很多炼丹活动,而他的“伏硫磺法”炼丹则是很有名的。孙思邈的“伏硫磺法”为:硫磺、硝石各2两,研成粉末放入锅中,用皂角3个引火,使硫和硝起火燃烧,火熄后再用生熟木炭3斤拌炒,到炭消 $\frac{1}{3}$ 为止。

由于经常给药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的教训,使唐代炼丹家取得了一项重要经验,就是硫、硝、炭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火药”。孙思邈在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2年)所撰《丹经》中记载的“伏硫磺法”炼丹,已被一般学者公认为我国最早的“火药”配方。他对发明火药,显然是有贡献的。大约在晚唐时,这一配方已经由炼丹家转入军事家之手,成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卷12载有丹药——“太一神精丹”,科学研究结果证实,其成份主要为 As_2O_3 ,由下列原料升华而得:丹砂(HgS)、曾青 $[Cu(OH)_2 \cdot 2CuCO_3]$ 、雄黄(As_2S_2)、磁石(Fe_3O_4)各6两;金牙(主要是Cu)2.5两。这种丹药对梅毒、疽疡、恶疮、癣痒很有疗效,特别是砒霜对回归热和慢性疟疾、假性疟疾,恶病质消瘦、贫血,肝脾肿大等症的疗效,比奎宁效果要好,并能改善血象而奏强壮之功。此丹从唐至宋,一直用以治疟,与现代砒霜的用法相似。

英国医师埃欧拉(Eowler)于1786年曾用砒霜的溶液治疟,引起人们的注意,称为“Eowler氏液”,晚于孙思邈达1,100多年。

(6) 针灸学成就

孙思邈在针灸方面,很注重针药并重,综合治理的原则。他曾指出:“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知药知针,固是良医。”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思想,是很有道理的。孙思邈还绘有经络腧穴图,这在我国是较早的。可惜现已失传。他的著作中记载了不少他自己的针灸经验和对针灸精辟的论述,对今日的临床应用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7) 孙氏的养生长寿学

孙思邈对养生长寿学颇有见地。他把老庄学说吐故纳新发展下来的“静功”与古代熊经鸱引而经华佗加以发展的“动功”结合起来,并讲究:食疗,讲究卫生、起居有规律等等。孙思邈本人就是他的营养生长寿学说的实践者。他很注重讲究卫生、预防疾病、持之以恒、长年锻炼身体,高龄达101岁。《旧唐书》载,当他已达90多岁时,还“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呢!

孙思邈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以上仅是简略情况。另外,孙思邈在总结发展医疗技术方面也有一些成就。比如他创造性的应用葱叶作为导尿管、施行导尿管,还有下颌脱臼复位术等。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的伤寒上、下篇所反映的自己治疗伤寒的经验,以及后来搜寻到了张仲景《伤寒论》后(写《千金要方》时,孙氏未见到仲景书的全本),对仲景《伤寒论》的大胆整理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孙思邈还对许多杂病,如糖尿病、骨关节病、水肿病、痢疾、麻疯等都有相当科学的认识结论。孙思邈还倡立脏病、腑病分类,具有新的系统性。此外,他对古秤的考证,对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度量衡,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高尚的医德和后世的纪念

在隋末唐初的战乱中，孙思邈亲眼目睹了隋炀帝的暴政，经受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对当时最底层人民缺医少药，少吃缺穿，备受战争等殃祸的凄惨遭遇有着亲身的感受。他对官府、权贵极为鄙视，而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却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因而，他虽考取进士，却终生不仕，坚辞皇帝的几次征召，不贪图富贵、名利，甘愿在家乡行医，过着贫困的生活，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为穷乡僻壤的百姓解除痛苦的事业。这一点是感人至深的。而更令人钦佩的乃是孙思邈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高尚医德。

作为一个医生，医德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医生自古便注重医师道德，如扁鹊、张仲景、华佗等名医，都对医德有所阐述。而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一开头就首先谈到这一问题。《大医习业》中说：要学习医学，首先必须钻研医学的经典著作，同时还要从多方面去“涉猎群书”，这样才能具有广泛的知识，才能对医学更有帮助。《大医精诚》中指出：“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他还告诫说：“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孙思邈还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热。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若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峨，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他还指出：做医生的不得与“病人多语调笑，看病时切忌大声喧嚷。绝不可道说是非、炫耀声名，诋毁他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载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这种言之有理、合乎实际、高尚的行医道德，能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被提倡、被推崇，的确是难能可贵和值得钦佩的事。孙思邈提出的这些原则，奠定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对后代医家的修养有良好的影响。

孙思邈完全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在长期的行医中，他不贫贵贱贫富，不顾风雨寒暑、白天黑夜、山区平原，一心一意地医病救人。对贫苦农民治病，经常不收诊金。有些不远千里来诊“恶病”者，他便让病人住在家里，日夜治疗，关照备至。他还亲自给病人喂饭、吃药、谈话安慰病人，很重视心理治疗。许多被伏侍的病人感动得流下泪来。唐初“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还有游学中的印度人揭陵迦等，都到他那里治过病。然而，孙思邈更多的是为贫苦农民治病。

孙思邈一生为人民，人民永世不忘孙思邈。从唐以来历代都有纪念活动。如公元1081年，孙思邈诞生500周年时，北宋刻立石碑，详细地记载了孙思邈的生平事迹，并在碑额上绘有画像。这座石碑，现在仍立于药王山南山上。这说明在距唐以后不久的宋代，孙思邈的名声就已是非同凡响了。在孙思邈采药和居住过的西太白山上，建有药王孙思邈的庙，并流传着药王孙思邈捉拿人参等许多神话故事。在耀县东北15里孙思邈的故里孙家塬村老堡子有孙思邈家的祠堂、坟墓。在耀县县城东约3里的漆河之滨，有五座风景幽美，古松翠柏簇拥着的小峰峦，原名“五台山”（唐时亦称磬玉山，宋至明清称五台山）。因为孙思邈曾在那里隐居，后来人们便改称“药王山”。山上修有“药王庙”，现有“拜真台”、

“太玄洞”、“洗药池”等遗迹。山上的北洞大殿，为明嘉靖37年（1558年）所建。大殿正中有高约3米的孙思邈坐像一尊。坐像后的“太玄洞”相传长40华里，由前山直通后山。大殿内东侧是孙思邈的医学著作陈列室。另外还有石佛洞、南庵（亦称静应庙），静明宫等建筑。南庵院内，有转纹古柏5颗，均为合抱巨树，相传为孙思邈亲手所植。在“太玄洞”旁，有一座亭子中，竖立着五座大石碑，为宋朝（公元1124年）时所刻立，叫做《千金宝要碑》，其上记载了孙思邈《千金方》中的900多个常见药方。大殿内还有一座明朝嘉靖21年（1542年）所刻的碑石，上刻《孙真人九转灵丹》等三个药方，为人们所重视。

解放后，祖国的医学遗产得到国家的很大重视。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孙思邈的《千金方》，以后又复重印。1961年，北京医学会还召开了孙思邈诞生1380周年的纪念大会。1962年，邮电部发行了两张纪念孙思邈的邮票，山东省还编演并出版了《孙思邈》剧本。已往每年农历二月初旬，药王山的民间性纪念活动也十分壮观热闹。药王山也得到政府的保护，曾多次拨出巨款全面修缮，如今面貌一新，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内外游客前往瞻仰者、络绎不绝。

人民长久地的纪念孙思邈，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也不是因为他和道家有什么关系，更不因为他是个什么神，什么仙，而主要是因为他医术高明，不慕名利，学问精深，甘愿终生为民解除痛苦，特别是他的《千金方》，创造性地、综合地发挥了当代和过去的人民医药知识，成为不朽的医学巨著，成为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而至今还有其重要价值。因此，孙思邈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被我国历代人民所永世不忘，是必然的，合乎情理的。孙思邈对祖国医学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我校举行

10月21日至23日，全省自然辩证法、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云集我校，正式成立了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省委书记、市委第一书记陈元方、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端棻、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我校校长郭琦等领导同志和13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由23名理事组成的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会。刘端棻同志任理事会理事长。

这届年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2篇，有20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其中《克山病“水土病因”假说的形成和发展》、《解放后我国机床工业的发展简史》、《从侯宗灏教授的几项科学研究中学习思想方法》、《试论我国公路交通的辩证法》、《黄土地貌发育中的辩证法》、《通向创造和发明的道路》等论文突出了地方特色、抓住了四化建设中的主要科研课题，得到好评，并已被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所选定，拟代表陕西参加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学术交流。

在谈到我省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今后任务时，陈元方等领导同志指出：西安是古代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中心，在这里研究自然辩证法更具有得天独厚的良好基础，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今后的任务：一是要以四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研究课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促进自然科学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二是要抓好普及工作，并积极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把自然辩证法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薛 鲍）